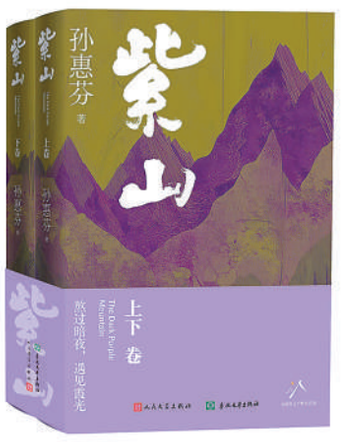
◎创作谈

在寂静中，倾听灵魂的声音

孙惠芬



告别《紫山》的写作已经半年有余，可写作时的感受一直都记忆犹新。我像一个毫无准备的历险者，被笔下人物带到一个又一个场景，一次又一次陷入沼泽，眼看着就要抓住一根稻草，稻草却不翼而飞，眼看着就要爬到彼岸，彼岸在一瞬间又变成了此岸……

说毫无准备，其实是有备而来，为了这部小说，我准备了近十年。2011年，我随大连医科大学团队做自杀遗族心理访谈，曾了解到一个家族内三人因情感纠葛而轻生的案例。

这是一个有关人类道德难题的故事，其中包含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爱与恨、道德与罪恶，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虚构作品中进行深挖和探讨。可是十年过去，我一直都没能动笔。或许有些作品，除了艺术储备之外，还需要年龄和经历作底——在我这里，艺术储备从来都没有游离在经历之外，它是与人性有关的知识和经验。而在人性这个幽深隐秘的未知世界，年轻时，我能触及到的可能只是表层，触及不到更深邃的东西。

在我早期的作品《歇马山庄》《上塘书》和《吉宽的马车》里，我想我写出了乡村人在城乡之间的矛盾和痛苦，写出了人性的困惑和迷惑，但却很少触及罪恶，很少触及沉沦之后的觉醒和超越。即使2011年有那一次访谈的经历，了解到那些遭遇苦难的人往往会陷入因与果的追问，从而精神世界会有一次意想不到的超越和上升，写下了《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和《寻找张展》，但关于人性的救赎和建立，只碰触到冰山一角。那片精神高地在作品里，仅仅是一束光，就像透过窗口照进来的光。

人性的建立，需要你对苦难有着深度的体悟和洞察，对人性有着深度的悲悯和同情，它需要你跳脱智力，不是用脑袋，而是用心，因为只有心才是智慧的根，才会照亮黑暗。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哈德良回忆录》创作笔记里写道：“有一些书，在年过四十之前，不要贸然去写。”等待了十年，我其实并不清楚自己在等待什么，只知道有一天灵感降临，我发现陷入沼泽的三个人向我走来。

这三个人背后，涉及到的正是人性的觉醒和超越。灵感告诉我，这一次，我不是去触碰冰山一角，而是冲着冰山而去，去钻探这冰山的全部。实际上，在等待的十年里，我一直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传统文化经典，或许正是先贤们的古老智慧激发出的思想，照亮了《紫山》。我的创作激情全面爆发，我对这样的写作充满期待。我的年龄，不是尤瑟纳尔说的四十岁，而是六十岁，叠加了岁月带给我的种种经历。为写好《紫山》，我无数次下乡走访，鲜活的故事记录了三大本，而在此之上，竟有两本厚厚的思考笔记——那是有关人物所处时代、出生家庭、性格特征的一些碎片化的分析，因为昨天的想法总被今天的想法推翻，所以写得很长。我期待着合上笔记本的一刻，这也是我每一次写作都要经历的时刻——只要笔记合上了，写作就开始了，写作一旦开始，笔记便永无翻开之日。

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我沉潜进那道想象世界打开的裂缝，似乎是纵身一跃就跳了进去，我希望自己捕捉到笔下人物每一个瞬间的表情，可令我想不到的是，我越是要深入进去，越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三个人，而是很多人。在我的笔记里，他们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像，有的连影像都没有，但当三个人锁定在那特殊的场域，人物一个个来了。他们不光来了，还发出了确定的声音。

这注定就是一场艰难的写作，它的艰难在于，我一方面需要将自己紧贴人物，与他们一起经受灵魂拷问，感受炙心烙肺的疼痛与觉醒，一方面需要倾听包围过来的各种声音——一桩与情感有关的悲剧事件，无疑要搅动起一座古老的村庄，当沉寂的乡村大地得以苏醒，那些沉默的人群脚踩大地、仰望苍穹，却深藏着种种隐秘的心声不得诉说，他们想通过我发声。

这正是小说写作最神奇的地方。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只要现实还存在），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我看到我笔下的世界在重新组合，可这么多男人女人向我涌来，我根本想不到。这使我常常陷入失语状态，因为当我凝视他们，看到他们欲说还休，常常不等下笔，情感就汹涌而至，而当我感情的通道有泪水涌动，修辞的通道顿时就拥塞狭窄……无奈之下，我不得不让自己长时间沉入寂静，在寂静中，去倾听那些灵魂的声音。

在寂静中倾听，用心，而不是用脑，这或许是《紫山》得以完成的重要秘诀。

不由得想起16岁那年的一个场景，当时海城发生7.3级地震，辽南的村庄震感强烈，大约有半个月时间，我和家人都住在搭在外面的草窝棚里。那样的夜晚，我专注在窝棚里的小世界，听着父母、奶奶惆怅的叹息，想象要是大地裂开一道口子，把村庄吞进去，而我和奶奶、父母还活着，我们该怎么办？有一个晚上，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是地震没发生，我们还活着，我将来一定要写一本大书，写掩埋在地下、没有机会发声的父母、奶奶的心声。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作家，那时候，也并不知道苦难为何物，更不知道在苦难中，精神世界里会有怎样的变化。但那时候，我强烈地知道，普通人的内心，最需要去书写。

实际上，在写作中，那些向我走来的小峪沟人里，就有我的奶奶、父亲和母亲，就有我的父老乡亲。或许他们经历的生活是别样一种，但无论哪一种，都需要在时间里熬过。

实际上，是跟随他们在时间里熬过，我才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当然，在寂静中倾听，你听到的一定是自己灵魂的声音，因为只有在那里，你才可以和更多人相遇，才有可能了解他们内心生活的全部。

（作者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

深入剖析典型文学案例

——读师力斌《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书写》

霍俊明

不久前，“啄木鸟文丛”推出师力斌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书写》（中国文联出版社）。师力斌的这些批评文字以“新媒体时代”为总体背景，彰显了一个批评家在新媒介形势下的思辨能力与言说能力。作者意识到，数字化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已经降临，我们必须正视新媒体给诗歌阅读与写作带来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电子科技、速运网络、人工智能、电子羊、仿生人、写诗机器人的讨论方兴未艾。如何在新的媒介语境中，探讨诗歌的自律性和内部特征，及其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恰恰是进入诗歌表盘内部的人，成为深究内在机制的勘察者、探询者、解剖者、诘问者。

因为在期刊工作的原因，师力斌长期深入驳杂的文学第一现场，视野延伸到选本、活动、新媒体、大众文化、文学传统之中，关注对象涵盖诗歌、小说、评论以及非虚构，由此可见一个批评家的开阔视野。

在师力斌的文学批评生涯中，诗歌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这从《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书写》一书中可以得到有力印证。就诗歌批评与研究而言，师力斌不只是对娜夜的诗歌以及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安琪的长诗集《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进行了精准的个案批评和文本细读，而且延伸到新诗的标题、形式、自由体、音乐性、写作难度以及大众化、媒体传播等问题，对其进行了深入剖析。众所周知，在100多年来的新诗发展进程中，诗歌选本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对诗歌史叙事以及诗歌史写作起到了塑形作用。作者注意到诗歌选本的重要性，围绕《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新世纪诗典》《北漂诗篇》等，对诗选的构造、特点、作用进行了详细而精准的分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17年开始，他与安琪连续7年合编《北漂诗篇》，将眼光投注在大众诗人身上，使得批评家的现场介入能力、文本细读能力以及浸润其中的人文情怀得以凸显。

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已经是老话题了，甚至仍有人会习惯性地强化其天然具有的互斥性。实际情况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无论是在社会实践还是文学的阅读、写作、译介、评价过程中，往往具有交叉性和共通质素，只可惜这两种话语的融合与对话在中国诗人这里经历了长期的搁置。难能可贵的是，师力斌能够从传统与现代对话的角度重新梳理和甄别、辨析新诗与古典诗词的问题，《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杜甫与新诗的现代性》《从古典诗学传统看新诗批评的建构》等文章既有建构性，又有启示性。在以杜甫为代表的诗歌传统的参照下，师力斌从好诗标准、正大与细小、载道与言志、真实与时代、继承与创新、格律与自由、实验与分寸感等方面鞭辟入里而又深入浅出地予以论证和阐释，对新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可信、可行的解决方案。

作者这些立足于传统的批评文章，将传统和现代作为一个“精神共时体”来对待，二者具有精神化的“时间结构”和“共有空间”。既然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是共时体的结构，那么“同时代性”就成为考察诗人的重要依据。在此前提下，杜甫就不再是一个古代的诗人，而是一个时时发挥效力和精神引领作用的“当代”诗人，正如师力斌在《杜甫与新诗的现代性》一文中所强调的：“杜甫既是古典诗歌集大成的诗人，也是一个新诗人，是自由诗人，是先锋派，是实验诗人，是需要重新打量、研究、继承的最重要的中国古典诗人。只有在‘诗’这个前提下，新诗古诗二元对立的思维才会被打破，才能在诗的意义上重新讨论新诗的现代性问题。”

无论是新媒体语境下诗歌生产以及传播的变化、传统与现代性关系，还是文学的思想力、小说的可能性以及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师力斌都通过典型案例、典型现象予以详细的论证与剖析。他的文学批评印证了一点，只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才能够成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而每一个时代都期待着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出现。

生态视域中的高原纪事

——评王小忠《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

周　聪

王小忠的散文集《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由《河源纪事》《车巴河纪事》《草地纪事》三部分组成，全书以“纪事”的形式，再现了采日玛、河曲马场、贡赛尔喀木道、天上玛多、九曲黄河、车巴河、尕海湖等地独特的高原地理景观，记录了牧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叩问草原生态、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甘南草原一直是作者关注与书写的对象，在“我”的观看中，高原的自然风貌得以呈现，而这种呈现又以“我”的在场为重要特征。比如，在《河源纪事》（上篇）中，站在贡赛尔喀木道，“北方的刚劲与江南的轻柔完全融为一体”，突然而至的立夏让“我”不知所措；在《湖边的候鸟》中，“远处群山上依然是皑皑白雪，雪线以下的松柏暗黑一片”，候鸟的栖息地尕海湿地显得静谧而神圣。

日常琐事是作者的落脚点，那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等，构成鲜活、丰富的细节，让《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更具温度与生活质感。例如，在《车巴河纪事》中，来自农区的“我”与牧区生活的旺秀刀智，因为“倒污水，倒炉灰”事件陷入了对峙。在旺秀刀智看来，“我”倾倒的污水，是对土地的亵渎。对土地、庄稼、牛羊、粮食等保持应有的敬畏，是当地居民的天性使然，大自然赐予了牧民生活所需，他们皆怀有感恩之心。旺秀刀智和“我”的矛盾，源于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在冲突之外，作者更加凸显的是人世间的温情。《一路与你同行》中，贡巴的一件衣服，让“我”倍感温暖，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帮扶。在《蛇的故事》与《龙胆花》中，一个固执、善良、勤劳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日常生活为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细节支撑，使得人物的性格更为真实、饱满、立体。

除去对高原景观及现实生活的呈现外，作者在叙述中有意加入了一些神话传说。比如，在《河源纪事》（上篇）中，贡保才让口中冬虫、夏草的传说故事，圣洁而凄美，那长角的虫子寄寓了人们对爱情的想象与期待。在《河源纪事》（下篇）中，黄河在四川改道，“迎娶”了“生”于四川的白河，展现了爱情的旖旎缠绵，这一传说被刻于云梯旁的石碑上。在《车巴河纪事》中，作者嵌入了蕨菜在汉代的一个传说，刘邦的儿子因食用蕨菜充饥致死，导致汉朝人从不食蕨菜，这可能是聪明人为了保护蕨菜而创造的“故事”。在《蛇的故事》中，蛇王口吐信子射向太阳，陷入绝境，在众蛇的祈祷下被赐肉翼，化身为龙族。蛇王射日不成，摇身一变成龙族的传说，改变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蛇的刻板形象。从散文的叙事策略上看，传说故事的植入，拓展了散文的容量，将那些来自历史的、民间的未定型的故事，与现实生活进行嫁接与关联，让作品在虚与实、过去与现在之间腾挪，从而丰富了散文的叙事形态。

《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是王小忠在草原行走与记录的产物，生态意识贯穿写作全过程。草原的沙化、虫草的过度挖采以及牧场被承包后草籽传播受限等现实问题，促使作者对草原生态保护有了更深的理解。王小忠在甘南生活多年，在城市与牧区之间奔走，在都市文化与农牧文明间碰撞，通过自己的眼睛与笔墨，记录下高原上熟悉而陌生的风景，并将内心的忧思与关怀以“纪事”的方式传递出来。

（作者系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编审，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

书写百万移民生活巨变

——读唐荣尧《出入山河》

翟　雄

唐荣尧的《出入山河：百万移民的时间记录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是作者在20多年新闻采访经历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描绘了一幅140多万贫困农民历时40年，从“苦瘠甲天下”的六盘山地区整体搬迁的生态移民图景。作品既有对宁夏境内4地市50多个村镇移民的描写，也有对“闽宁镇”的专章书写，充满鲜明的时代特征，充盈着鲜活的生命力。

这几年，唐荣尧主要从事非虚构文学创作并不断突破自我，试图在写作中融入人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知识，努力用记者的耳朵、行者的脚步、作家的情怀、诗人的激情、历史学者的眼光，忠实记录百万移民的故事。跟作者以往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的创新之处很明显，对叙述的把控更为张弛有度，人物、场景的衔接更加从容，铺垫更细致，让沉睡的历史以非虚构的姿态进入文本，试图让读者明白，移民工程不仅仅是移民和政府的事，更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这种写作注定是艰巨的。作品需要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贫穷落后与富裕发达的关系，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把现实的观照镶嵌进恢宏的历史中。几百公里之外的移民点就像一个巨大磁盘，或一个圆心，闪闪发光，吸引着贫困地区的人们对它产生无限向往。围绕着移民点，老人、孩子和年轻的父母都跟这个中心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并深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移民后，生活境况的显著改善，是时代发展进步的缩影。

作品开篇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一个叫“老驴”的中年移民和他的老驴的故事。作者静观默察生活的甜酸苦辣，提炼逼真感人的细节，试图工笔画般描摹移民们的艰难跋涉，把他们对故土的留恋，对新生活的渴望，对新移民点的期盼和好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颇具象征意味。这哪里仅仅是“老驴”和他的老驴的故事，而是移民们的故事。生态移民工程实施过程中，他们以各自不同而又相似的方式，在历史长河中铺就了一条条带着色彩和亮度的人生轨迹，彰显了奋斗、变革、与贫困抗争的精神，定格下时代发展的脚步。

作品的新意还体现在对地域文化的呈现上。作者对上百位移民家庭进行了深入了解，对中国最大的易地搬迁移民集中安置区红寺堡区进行了全方位描写，多维度关注了移民在搬迁前后教育、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聚焦移民们的乡愁如何安放这一重要问题，在沉甸甸的历史与轻盈具象的个体叙事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出入山河：百万移民的时间记录本》不仅让这一辈人能够看到自己的故事，看到他们曾经的所思所想，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幅带有时代印记的“移民图”。

长篇小说《凤舞》：

呈现女性的坚韧与力量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凤舞》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凤舞》作者程青，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青年文学》主编张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围绕这部展现平凡女性顽强与韧性的作品进行了对话。

《凤舞》讲述了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苏北女孩凤舞横跨半个世纪的成长故事。凤舞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是“我”童年时的玩伴与挚友。作品细腻呈现了主人公从读书识字到步入社会、从情窦初开到结束婚姻等人生各阶段面临的压力与困扰，彰显主人公对友情、爱情和亲情的真挚抛洒。故事最后，凤舞在福利院收养了一个残疾女孩，把自己的爱献给需要帮助和关怀的人。

程青表示，《凤舞》是其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旨在呈现“一个女性如何从荒芜中生长出爱的力量”。她将人物命运紧贴时代，力图让作品拥有鲜明的年代感。

徐晨亮认为，《凤舞》的独特之处在于“从非典型人物入手，写出时代与个人的复杂关系”。凤舞既“深不可测”又“清澈透明”的性格，正是外部环境与人性韧性交织的产物。

张菁认为，《凤舞》的魅力来源之一，是它带给读者的“融合”体验感，那些隐藏在书中的生活细节、人物关系以及字里行间的爱、理解与体恤，唤醒了我们的精神记忆。